

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微观福利效应*

李兆辰

[摘要] 提升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精准性,对于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政策对象为视角构建“动机—行为—效果”分析框架,将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福利效应划分为参保、转换和给付三个阶段,将现有理论纳入统一框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针对参保者的三个阶段选取回归模型,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政策内部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在参保者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福利效应,且与风险因素、流动性因素和财富因素具有交互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根据不同阶段和影响因素,完善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精准保障,在参保阶段通过加强自主性提高行为适配的精准性,在给付阶段通过加强统筹性提高影响因素适配的精准性,在转换阶段通过加强规范性提高政策执行的精准性。

[关键词] 社会养老保险;福利效应;社会保障;老龄化;新农保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863 (2023) 12-0096-07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加快发展,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提高精细化程度。”^[1]

现有文献对于社会养老保险的福利效应,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宏观视角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养老保险的整体效果,分析其如何发挥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进而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2] 社会养老保险不仅在总量上能够促进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3] 而且在结构上有利于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4] 实现效率—福利动态平衡,助力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

代化和高质量发展。^[5] 从微观视角来看,社会养老保险的福利效应既表现在以消费为代表的客观福利水平的提高,^[6] 又体现为以满意度为代表的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7] 与此同时,对于社会养老保险福利效应的精准性,现有文献研究了在不同收入水平^[8]、城乡区域^[9]、消费类别^[10]等方面的异质性影响。

可以看到,现有文献对于社会养老保险福利效应的研究,通常将这一政策整体作为一种处理效应,进而检验其实际效果。然而,参保者在经历社会养老保险不同阶段的过程中,受到的政策影响也可能不同,^[11] 即在政策内部具有异质性。因此,打开政策评估的“01”黑箱,分析政策不同阶段体现出的福利效应,对于理解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本文以政策对象为视角构建“动机—行为—效果”分析框架,将社会养老保险的福利效应划分为参保阶段、转换阶段与给付阶段,将现有理论纳入统一框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针对参保者的三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与政策选择”(编号:20&ZD07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新一轮科技革命下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与实现路径研究”(编号:22JD710023);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生育政策、生育选择与人力资本投资: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编号:2022THZWYY01)

作者:李兆辰,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智能治理实验室助理研究员,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北京 100732

个阶段进行实证分析,选取相应的回归模型,检验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微观福利效应。

二、“动机—行为—效果”分析框架

对于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福利效应,现有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三种理论路径:预防性储蓄理论、流动性约束理论以及生命周期理论。现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通常将养老保险这一政策作为一个变量,进而研究对于不同群体和不同方面的影响。然而从参保者的视角来看,在不同阶段会受到不同的福利效应,这种政策内部的异质性难以通过现有框架进行分析。

本文以参保者为视角建立“动机—行为—效果”分析框架,将福利效应划分为三个阶段:参保阶段、转换阶段、给付阶段,并根据现有理论路径将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三种效应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进而对参保者的不同阶段进行分析。在这一框架中,“动机”维度是指参保者受到社会养老保险影响的原因和途径,包含风险转移效应、流动性约束效应以及财富替代效应;“行为”维度是指参保者的实际行为,会受到收入、政策、所在地区等多方面的影响;“效果”维度是指社会养老保险的实际效应,即本文分析的微观福利效应,需要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进行有效识别。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其中,参保阶段指参保者参加社保并定期缴纳费用的阶段,转换阶段指参保者从完成全部缴费到开始领取给付之间的转换阶段,给付阶段指参保者完成规定年限缴费后定期领取给付的阶段。参保者的福利效应取决于每个阶段多种政策效应叠加后的结果。

(一) 风险转移效应

对于风险转移效应的解释主要来自预防性储蓄理论及其派生理论。当消费者面临不确定性时,将不会按照生命周期理论来配置消费,而是更多按照当期收入进行消费。不确定性导致的未来风险越大,消费者就会更多进行预防性储蓄,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的风险。参保者会在拥有养老保险后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消费。^[12]

从参保者的角度来看:在参保阶段,参保者会根据养老保险政策的具体情况降低自身对于未来风险的预

期,进而调整当期的储蓄和消费行为,因此在参保阶段对消费具有正向影响;在转换阶段,参保者自身面临的不确定性发生改变,与此相关的预防性储蓄行为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在转换阶段对消费的影响是存在断点;在给付阶段,参保者能够根据养老保险规定定期获得养老金,从而提升处理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减少预防性储蓄,因此在给付阶段对消费具有正向影响。

(二) 流动性约束效应

对于流动性约束效应的解释主要来自于流动性约束理论及其派生理论。尽管可以通过信贷等方式进行消费行为最优化,但是消费者在发达金融市场中仍然面临流动性约束,无法完全根据自身意愿进行无成本的借贷,消费决策是在流动性约束下的最优化。在此情况下,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更依赖于当期收入,同时受到未来流动性约束预期的影响,会对自身的消费行为进行调整。参加养老保险的缴费以及领取养老金的批次都会产生流动性约束。^[13]

从参保者的角度来看:在参保阶段,参保者虽然知道未来将会获得给付,但当期的养老保险缴费改变了当期的可支配收入,对消费决策产生了流动性约束,因此在参保阶段对消费具有负向影响;在转换阶段,参保者在完成规定年限缴费后,不再面临这一流动性约束,因此在转换阶段对消费的影响存在断点;在给付阶段,参保者不能自由提取和支配全部养老金,需要按照规定时间分次领取,在此方面具有一定的流动性约束,因此在给付阶段对消费具有负向影响。

(三) 财富替代效应

对于财富替代效应的解释主要来自生命周期理论及其派生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关注的重点在于居民个体会将自身总收入在整个生命周期当中进行配置,为了维持老年时期的福利水平,而在当期对储蓄和消费进行选择。养老保险金能够作为一种财富替代家庭资产,使得参保者减少以养老为动机的当期储蓄,增加当期消费。^[14]

从参保者的角度来看:在参保阶段,一方面参保者的缴费会减少当期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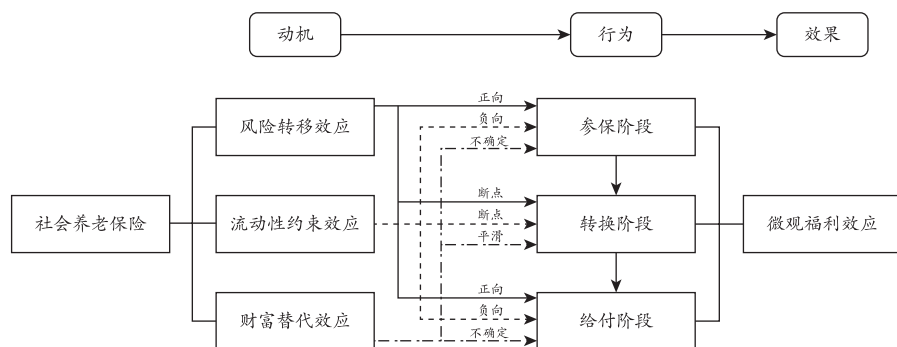


图1 “动机—行为—效果”分析框架

以作为一种财富替代,从而对当期储蓄产生替代作用,二者共同对参保阶段的影响与参保者的替代倾向和未来期望有关,因此在参保阶段对消费的影响不确定;在转换阶段,财富替代效应会使得参保者对于获得养老金给付前后的收入进行配置,因此在转换阶段对消费的影响是保持平滑;在给付阶段,养老保险的给付会增加参保者的当期可支配收入,同时养老保险本身又作为一种财富能够在未来继续获得给付,因此在给付阶段对消费具有正向影响。

参保者在每个阶段实际受到的福利效应,取决于多种政策效应各自的强度以及相互叠加之后的总效应。

三、政策背景及研究假说

(一) 政策背景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研究社会养老保险的福利效应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社会养老保险的作用周期较长、干扰因素较多,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对其效应进行有效识别,并关注政策内部的异质性,打开政策评估的“01 黑箱”。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相对城市较低,社会保障体系相对不够完善,且由于人均收入较低,在社会保障资源和公共服务方面的选择空间相对较少。在这种现实条件下,农村地区受到某项特定社会保障政策的实际影响相对更强,社会保障支出的效果更加明显。^[15]因此,本文选取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并构建具有一般性的“动机—行为—效果”分析框架,以便在实证分析中减少干扰,提高回归的有效性,更好分析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微观福利效应。

我国在 2008 年第一次提出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即新农保,并在 2009 年公布了首批新农保试点。试点制作为我国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模式,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6]新农保政策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1)参保范围。新农保针对的是年满 16 周岁且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不包含在校学生。符合参保范围的群体可在户籍所在地自愿参加新农保。(2)筹资模式。新农保基金由三部分筹资构成: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个人缴费为 100–500 元/年,分为五个档次,地方可以根据实际增设档次。政府补贴分为中央补贴和地方补贴,中央根据不同地区发达程度确定标准,地方补贴标准由地方政府根据自身情况决定。(3)给付待遇。新农保参保者的养老金账户采用“个人账户+基础养老金”模式,参保者可以终生获得给付。给付计算方法为:月给付金额=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139+月基础养老金,地方财政可在中央财政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具体规定。(4)领取条件。新农保领取给付的条件为:年满 60 周岁,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且户籍为农村。

(二) 研究假说

考虑到在新农保政策内部的不同阶段,参保者受到的福利效应可能存在异质性,本文将参保者受到新农保政策的实际影响划分为参保阶段、转换阶段与给付阶段,对每个阶段的福利效应分别进行分析。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采用福利经济学进行政策评估的常见做法,使用能够被货币量化的居民消费作为福利衡量。

在新农保的参保阶段,参保者每年都需要进行缴费,一方面缴费导致的流动性约束可能对消费产生负向影响,另一方面参保者能够将当期的部分预防性储蓄转化为消费。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1。

假说 1:在参保阶段,新农保对参保者福利水平的影响与风险因素和流动性因素具有交互作用,综合影响为不显著。

在新农保的转换阶段,参保者不再面临缴费导致的流动性约束,然而这一政策时点是参保者已经提前形成确定预期的,能够提前针对这一变化进行配置。同时,由于农村居民不存在固定退休时间,风险转移效应并不存在突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2。

假说 2:在转换阶段,新农保对参保者福利水平的影响为保持平滑。

在新农保的给付阶段,参保者能够每月领取给付,尽管个人养老金账户无法随意支配,但定期领取养老金这一机制使得给付阶段具有较强的财富替代效应,且这一稳定预期能够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对消费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3。

假说 3:在给付阶段,新农保对参保者福利水平的影响与风险因素、流动性因素和财富因素具有交互作用,综合影响显著为正。

四、模型及数据

(一) 实证模型

在实证研究中,本文分别针对参保者的三个阶段选取相应的实证策略,对假说 1 至假说 4 进行实证分析。

1. 参保阶段

对于假说 1,本文分别通过普通最小二乘(OLS)和倾向得分匹配(PSM)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参保阶段的福利效应。

首先,本文对 60 岁以下的样本建立以下基准回归模型:

$$Y_i = \beta_0 + \beta_1 Treat_i + \beta_2 X_i + \eta_i + \epsilon_i$$

其中, i 表示居民个体;被解释变量表示居民消费,以家庭人均年支出作为衡量;核心解释变量 $Treat_i$ 表示是否参加新农保,参加则为 1,未参加则为 0; X_i 是一组控制变量,包含家庭年收入、家庭资产、家庭成员数、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工作性质、健康水平、是否有医

疗保险; η_i 为地区固定效应,使用居民所在省份的虚拟变量衡量; ε_i 为随机误差项。对于回归模型中所有表示金额的变量,在回归时均取对数进行计算。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加入 $Treat_i$ 与不同影响因素的交互项。其中,风险因素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主观感知程度,流动性因素包括在正式流动性、非正式流动性和转移流动性中的占比,财富因素包括在现金、存款和资产中的占比。

考虑到选择性偏差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 PSM 的方法对参保阶段进行分析,将 60 岁以下的样本分为对照组 ($Treat_i=0$) 和处理组 ($Treat_i=1$),将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进行核批配,从而减少选择性偏差,提高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 转换阶段

对于假说 2,本文通过断点回归 (RD) 进行实证研究,分析转换阶段的福利效应。

在转换阶段,处理效应 D_i 表示居民 i 是否获得给付,获得给付则为 1,反之为 0, D_i 由驱动变量即年龄 Age_i 决定。由于新农保政策在 60 岁以后进入给付阶段,记断点 $Age_0=0$,则有:

$$D_i = \begin{cases} 1, & Age_i > 60.5 \\ 0, & Age_i < 60.5 \end{cases}$$

在政策实际执行过程中,各个地区实施给付的执行标准不同,某些地区的给付时间并没有严格按照 60 周岁划分。因此,本文采用模糊断点回归对给付阶段进行分析。在此情况下,虽然驱动变量 Age_i 影响处理效应 D_i ,但是在 60.5 岁前后并非从 0 到 1 的变化,而是增大了 D_i 取值为 1 的概率。在模糊断点回归中,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进行估计,第一阶段回归模型可以表示为:

$$D_i = \delta + f(Age_i) + \theta T_i + \mu_i$$

其中, T_i 为 D_i 的工具变量, T_i 在 Age_i 大于 60.5 时为 1,反之为 0。 $f(Age_i)$ 表示一个多项式函数, δ 为截距项, μ_i 为随机误差项。

第二阶段回归模型可以表示为:

$$Y_i = \alpha + \beta D_i + f(Age_i) + \varepsilon_i$$

其中,被解释变量 Y_i 表示居民消费,以家庭人均年支出作为衡量, α 为截距项, ε_i 为随机误差项。

3. 给付阶段

对于假说 3,本文通过双重差分 (DID) 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给付阶段的福利效应。

本文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如下:

$$Y_i = \beta_0 + \beta_1 Treat_i \times Post_i + \beta_2 Treat_i + \beta_3 Post_i + \beta_4 X_i + \eta_i + \varepsilon_i$$

其中, i 表示居民个体;被解释变量 Y_i 表示居民消费,以家庭人均年支出作为衡量;分组变量 $Treat_i$ 表示

是否参加新农保,参加则为 1,未参加则为 0;时间变量 $Post_i$ 通过个体 i 的年龄进行衡量,大于 60.5 岁即为 1,小于则为 0; X_i 是一组控制变量,包含家庭年收入、家庭资产、家庭成员数、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工作性质、健康水平、是否有医疗保险; η_i 为地区固定效应,使用居民所在省份的虚拟变量衡量; ε_i 为随机误差项。对于回归模型中所有表示金额的变量,在回归时均取对数进行计算。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同样进一步加入 $Treat_i \times Post_i$ 与不同影响因素的交互项。

(二) 数据

本文在实证分析中所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由于我国从 2014 年开始将新农保与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合并管理,本文采用 2012 年的 CFPS 调查数据对新农保的阶段福利效应进行检验。成人数据库和家庭经济数据库分别包含 35719 个和 13315 个样本,数据调查范围涵盖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本文在数据预处理中,首先选取数据库中的农村居民样本作为研究对象,然后将缺少本文所用变量的样本以及异常值样本剔除,并且限制样本为未参加其它类型养老保险的样本。本文通过家户号将成人数据库与家庭经济数据库进行匹配,得到实证分析所用的 15176 个样本。

五、实证结果

(一) 参保阶段

为了检验假说 1,本文分别通过 OLS 和 PSM 检验新农保在参保阶段的福利效应。参保阶段的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1 中。其中,Panel A 为使用 OLS 的回归结果,Panel B 为使用 PSM 的回归结果,第 (1) 列为基准回归结果,第 (2) - (4) 列为与不同影响因素进行交互的回归结果。由于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较小,为便于报告结果,被解释变量为 $\ln Y$ 乘以 100。

表 1 参保阶段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ln Y \times 100$	(1) 基准回归	(2) 风险因素	(3) 流动性因素	(4) 财富因素
Panel A: OLS 回归				
$Treat \times Factor$		0.275*** (0.069)	-0.169** (0.072)	-0.080 (0.077)
$Treat$	-1.974 (1.959)	-2.023 (1.965)	-1.847 (1.908)	-1.937 (1.936)
R^2	0.205	0.218	0.216	0.211
样本量	12019	12019	12019	12019
Panel B: PSM 回归				
$Treat \times Factor$		0.431** (0.170)	-0.021** (0.008)	-0.015 (0.010)
$Treat$	-0.360 (0.365)	-0.366 (0.370)	-0.343 (0.351)	-0.347 (0.349)
R^2	0.177	0.188	0.186	0.183
样本量	12019	12019	12019	12019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回归均包含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从表1的第(1)列可知,新农保对于参保者在参保阶段的消费水平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尽管核心解释变量 $Treat$ 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并不显著,表示新农保在参保阶段并未显著压低参保者的消费水平。在PSM回归通过核匹配消除协变量的显著差异之后,处理组在参保阶段仍然未受到显著影响,体现出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进一步,第(2)–(4)列的交互作用的回归结果显示,新农保与风险因素具有正向交互作用,与流动性因素具有负向交互作用,且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参保阶段,当参保者面临更大的风险时,新农保的福利效应更强,而当参保者面临更强的流动性约束时,新农保的福利效应更弱。OLS与PSM的回归结果呈现出较强的稳健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又采用替换变量、样本缩尾、排除其他险种养老保险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依然保持稳健。

因此,假说1成立:在参保阶段,新农保对参保者福利水平的影响与风险因素和流动性因素具有交互作用,综合影响为不显著。

(二)转换阶段

为了检验假说2,本文通过模糊断点回归检验新农保在转换阶段的福利效应。为了验证驱动变量未受操控,本文通过图2画出了参加新农保的样本在不同年龄的频率分布。图2显示,不同年龄的样本在60.5岁附近并未产生异常分布,驱动变量未表现出受到操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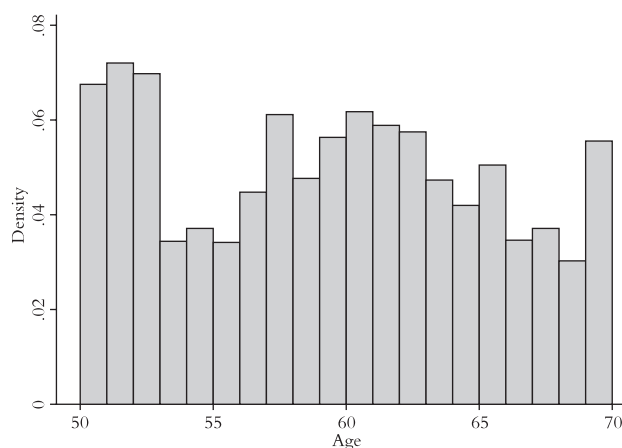


图2 驱动变量的频率分布

接下来,本文通过图3画出参加新农保的不同年龄样本领取新农保给付的比例,直观展现了年龄断点附近是否接受政策处理效应的变化。图3显示,参保者在60.5岁前后领取新农保给付的比例存在明显跳跃,但并不是全部样本都严格按照60.5岁作为断点,符合政策背景部分的分析,不同地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标准和规范程度不同,应当采用模糊断点回归的方法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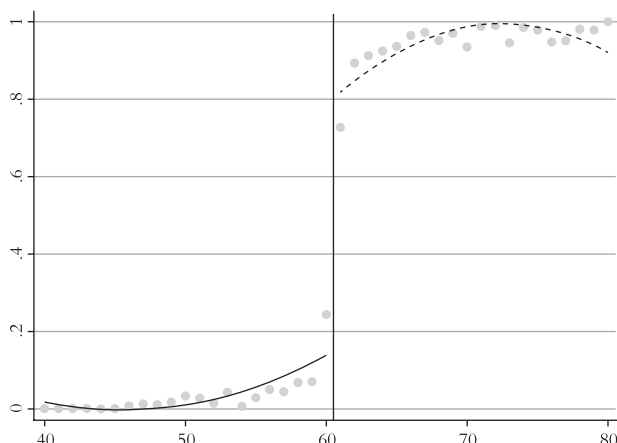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年龄样本领取新农保给付的比例

模糊断点回归结果如图4所示。在年龄断点附近,局部沃尔德估计值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消费水平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回归结果表明,新农保并未导致参保者在60.5岁附近的消费出现断点。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选用了不同的带宽、核函数等作为模糊断点回归的参数,均未表现出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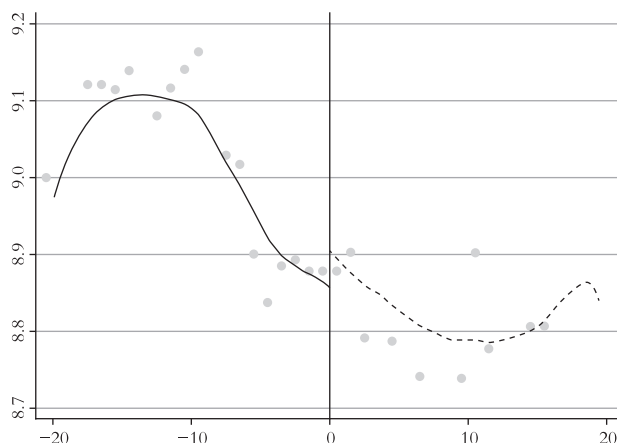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年龄参保者的消费变动情况

断点回归结果表明,在60.5岁前后,尽管参保者是在是否领取新农保给付方面存在断点,但新农保政策并未导致参保者的消费出现断点。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新农保政策在参保者和未参保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仅表示在参保者群体中没有产生局部断点。

因此,假说2成立:在转换阶段,新农保对于参保者消费水平的影响是保持平滑。

(三)给付阶段

为了检验假说3,本文通过DID检验新农保在给付阶段的福利效应。考虑到政策文本与政策执行之间的差异,本文在DID回归中分别根据政策文本和政策执行作为给付阶段的判断依据。根据政策文本,新农保的给付阶段应该从参保者年满60周岁开始;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部分样本领取给付的时间早于或晚于60周岁,并未严格按照政策文本执行。因此,表2的Panel A使用政策文本规定的时间判断给付阶段,即在

60.5 岁之前为 0,之后为 1;而 Panel B 使用政策执行的
实际时间判断给付阶段,即在实际领取给付前为 0,之
后为 1。

表 2 给付阶段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lnY × 100	(1) 基准回归	(2) 风险因素	(3) 流动性因素	(4) 财富因素
Panel A:根据政策文本				
<i>Treat × Post × Factor</i>		1.263*** (0.355)	-0.904** (0.360)	-0.101** (0.065)
<i>Treat × Post</i>	9.275** (4.341)	7.881*** (2.793)	9.329*** (3.392)	9.307** (4.343)
R ²	0.209	0.228	0.220	0.213
样本量	15176	15176	15176	15176
Panel B:根据政策执行				
<i>Treat × Post × Factor</i>		1.173*** (0.328)	-0.878*** (0.327)	-0.100** (0.032)
<i>Treat × Post</i>	8.506*** (3.066)	7.241*** (2.647)	8.823*** (3.088)	8.757*** (3.085)
R ²	0.215	0.231	0.218	0.213
样本量	15176	15176	15176	15176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
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回归均包含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从表 2 的第(1)列可知,无论是根据政策文本还
是根据政策执行,新农保对于参保者在给付阶段的消
费水平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核心解释变量 *Treat ×*
Factor 的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新农保对于参保
者在给付阶段消费水平的提升程度为 9.275% 和 8.506%。

进一步,第(2)–(4)列的交互作用的回归结果显
示,新农保与风险因素具有正向交互作用,与流动性因
素和财富因素具有负向交互作用,且均在 5% 或 1% 的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给付阶段,当参保者面
临更大的风险时,新农保的福利效应更强,而当参保者
面临更强的流动性约束和财富替代时,新农保的福利
效应更弱。根据政策文本与根据政策执行的回归结果
呈现出较强的稳健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又采用替换
变量、样本缩尾、排除其他险种养老保险的方式进行稳
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依然保持稳健。

因此,假说 3 成立:在给付阶段,新农保对参保者
福利水平的影响与风险因素、流动性因素和财富因素
具有交互作用,综合影响显著为正。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政策对象为视角构建“动机—行为—效果”
分析框架,以新农保为例,实证分析了参保者在参保阶
段、转换阶段与给付阶段获得的福利效应,检验了本文
提出的三个假说。研究发现:在参保阶段,新农保对参
保者福利水平的影响与风险因素和流动性因素具有交
互作用,综合影响为不显著;在转换阶段,新农保对参
保者福利水平的影响为保持平滑;在给付阶段,新农保
对参保者福利水平的影响与风险因素、流动性因素和
财富因素具有交互作用,综合影响显著为正。

社会养老保险具有政策内部的异质性,福利效应

在参保者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特征。因此,进一步
健全我国养老保险体系,需要充分考虑不同政策阶段
和影响因素,实现覆盖参保者全生命周期的精准保障。

第一,在参保阶段,通过加强自主性提高行为适配
的精准性。不同参保者在风险偏好、收入水平、未来预
期等方面存在差异,会在不同险种选择、缴费档次选择
等方面具有不同倾向。当前,我国养老保险体系提供
给参保者的自主选择空间较为有限,尤其是在第一支
柱养老保险中,参保者能够结合自身情况进行选择的
范围较小,存在通过加强自主性而获得帕累托改进的
空间。一方面,可以扩大缴费档次的选择范围,为参保
者提供更多自主选择空间;另一方面,可以加强不同险
种之间的衔接和协调,减少参保者进行自主选择的成
本。因此,加强参保选择的自主性,有利于提高养老保
险体系的筹资规模和精准性,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多支
柱的养老保险体系。^[17]

第二,在给付阶段,通过加强统筹性提高影响因素
适配的精准性。当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在给付阶段
采用基础养老金 + 个人账户的方式,地方财政可在中
央财政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具体标准。在此情
况下,参保者的整体福利水平获得了显著正向影响。
然而,这一模式在基础养老金方面依赖地方政府的财
政能力,部分地区面临社会保障水平与财政可持续之
间的抉择。当前,我国已明确提出适当加强中央在养
老保险方面的事权,这一方向的重要体现就在于加强
社会养老保险的统筹性,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形成统一大市场。^[18]因此,进一步加强统筹性,有利
于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现长期平衡,更好发挥社
会养老保险在保障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公平方面的重要
作用。^[19]

第三,在转换阶段,通过加强规范性提高政策执行的
精准性。参保者在转换阶段的福利水平之所以保持
平滑,是因为养老保险政策在参保时就明确了转换时
点,从而使参保者能够基于稳定预期,在自身的全生命
周期中进行福利配置。然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部分
地区并未严格按照政策规定的时间点完成从参保到给
付的转换。政策执行的规范性不仅关乎具体环节的稳
定预期,还关乎参保者对养老保险政策的规则认知,从
而影响参保者与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提高政
策执行的规范性,是健全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内
容,也是实现政策设计目标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 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促进社会

- 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N].人民日报, 2021-02-28.
- [2] 赵欣彤, 杨燕绥. 我国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政策评估——基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7).
- [3] 张苏, 王婕. 养老保险、孝养伦理与家庭福利代际帕累托改进[J]. 经济研究, 2015(10).
- [4] 周广肃, 张玄逸, 贾坤, 张川川.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J]. 经济学(季刊), 2020(4).
- [5] 袁富华, 李兆辰. 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分析: 效率——福利动态平衡与治理[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3(2).
- [6] 岳爱, 杨鑫, 常芳, 田新, 史耀疆, 罗仁福, 易红梅.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日常费用支出的影响[J]. 管理世界, 2013(8).
- [7] 邓大松, 杨晶. 养老保险、消费差异与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19(4).
- [8] 张翔, 宋寒冰, 吴博文. 收入、预期寿命和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效应[J]. 统计研究, 2019(3).
- [9] 汪伟, 刘玉飞.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融入城乡养老保险体系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6(6).
- [10] 张跃华, 王翌宵.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贫困群体生活的影响——基于 CHARLS 2011 ~ 2015 面板数据的分析[J]. 保险研究, 2019(5).
- [11] 高原. 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参保人消费行为的阶段性影响[D]. 北京: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7.
- [12] Okumura T, Usui E. The Effect of Pension Reform on Pension-benefit Expectations and Savings Decisions in Japan. *Applied Economics*, 2014(14).
- [13] Ludygson S. Consumption and Credit: A Model of Time-Varying Liquidity Constrain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9, 81(3).
- [14] Cohn R A, Kolluri B R.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Saving in the G-7 Countries: Recent Evidence. *Applied Economics*, 2003, 35(10).
- [15] 李胜会, 熊璨. 社会保障财政支出: 城乡效率差异及原因[J]. 公共管理学报, 2016(3).
- [16] Zheng S, Li Z. Pilot Governance and the Rise of China's Innova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63).
- [17] 林闽钢, 梁誉. 准市场视角下社会养老服务多元化筹资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6(7).
- [18] 李兆辰, 袁富华. 统一大市场作为公共物品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
- [19] 黄永颖, 张克中, 鲁元平. 统一大市场建设: 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3(1).

(责任编辑 齐明)

The Micro-Level Welfare Effect of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Policy

Li Zhaochen

- [Abstract]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polic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multi-leve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motivation—behavior—effect”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objects, dividing the welfare effect of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policy into participation, transition and payment stages, bringing the existing theories into a unified framework.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selects the corresponding regression model for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insured, through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data, analyzing the policy's internal heterogeneity. This paper finds that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policies exhibit different welfare effect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insured individuals, and interact with risk factors, liquidity factors and wealth factors.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precise insurance covering the whole life cycle, emphasizing the need to enhance the autonomy during the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stage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behavioral adaptation, to enhance the coordination during the payment stage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influencing factor adaptation, and to enhance the normativi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stage to improve policy execution accuracy.
- [Keywords]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welfare, social security, population aging, new rural pension scheme
- [Author] Li Zhaochen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